阅《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后的一些随感

杨逢诜

[摘 要]本文是对于《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的阅读笔记，包括对于本书整体谋篇布局的结构的分析、阅读全书的整体感受以及对于这本书的历史背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文化革命运动）的分析；书中一部分有关于习近平本人的生活细节在后文中也有所提及；本文试图提取出习近平本人一些令人尊敬的特质。

[关 键 词]习近平；梁家河大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中图分类号]D616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这本书（以下简称《七年岁月》），通过列举一系列与习近平总书记有关的同志的访谈记录，生动翔实地为我们描述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插队时的一系列宏观背景和微观的生活细节。这些细节使得我们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一政治性运动的具体历史背景和当年知识青年们的具体生活环境，使得我们对于我国上世纪60-70年代的国史国情以及文化革命运动史的认识更加深刻；同时这本书展现出的习近平总书记的生活细节也使得我们能够充分地感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个人魅力和才能，也使得我们离这位看似高不可攀的人物更近了一层。

一、阅读全书后的整体感受：

在过去（尤其是在过去的学习生活中），我们对于习近平总书记的了解，大多来自于中央电视台的新闻，地方上的报刊、杂志，以及一些并不确凿的小道消息。通过这样的一本访谈实录，我们看到了总书记那隐藏在银幕和报纸背后的一面。而这一面，反而对于我们而言是至关重要的。

**（一）全书的总体架构：**

说实话，这种采用访谈实录题材的著作是我以前所从未见过的，这种体裁也是我本人感到些许的新鲜。这本书的访谈记录编排顺序，是依照被访谈者与习近平总书记之间接触多少排布的：先是60-70年代与总书记一同插队的知识青年，其次是总书记插队时的三级（村、公社、县）干部，再次是梁家河和赵家河当地的村民，再次就是一些与总书记仅仅有一面之交的人。这种编排方式有它一定的合理性——我们可以在读这本书的时候预先建立一条总书记在插队期间的活动的时间主线，然后依据后面的访谈记录逐渐地使这根时间主线变得丰富。这其中，有些事情的重复叙述是几乎不可避免的，然而这里的“重复叙述”却并不能够等同于复制或者复述。比如习近平在梁家河带头办沼气的事情，知青、干部、村民的访谈记录中就都有涉及，但是三者对于这一件事的叙述具有不同的侧重点。知青和干部的叙述侧重于习近平本人在这一活动中的努力，而村民的叙述则侧重于习近平学沼气、办沼气这件事为他们带来的切实的好处，以及村民在这一件事中的态度转变。这种方式的记录，一方面使之具有了较高的可信度和效度，另一方面也使得读者对于这一事件具有了更加深入、更加丰富的了解。

采用这种访谈实录的体裁，一方面是给出了“不同人眼中的习近平”，使得我们对于习近平总书记的了解能够更加深入；另一方面，由于有可见的交叉对比，这本书所记述的事件也具有了相对而言更高的信度和效度。同时我们又注意到，《七年岁月》的后面几篇访谈的被访谈者与习近平的关系并不十分近。他们的叙述对于塑造习近平本人的人物形象似乎是无关紧要的，但是他们的叙述却能够使得我们进一步地了解上世纪60-70年代的文化革命运动的政治背景，而这一历史背景对于本书的编排而言则相当重要——人总是要生活在一定的历史阶段、社会结构中的。脱离了具体的历史的社会背景来谈论人是没有意义的，无论是总书记，还是其他的知识青年，皆是如此。

**（二）习近平的整体经历和随感：**

在到陕北延川地区插队的七年中，习近平的生活经历似乎很简单——1969年到1973年间一直在梁家河大队从事农业劳动；1972年加入共青团；1973年到赵家河大队从事社教工作；1974年入党并在梁家河大队担任党支部书记；1975年被推荐进入清华大学深造。这段看起来相当乏味的履历的背后实际上隐藏着许多我们过去并不熟悉的故事。

在1969年习近平刚到陕北延川地区的梁家河大队插队的时候，与他同队的几位知青不约而同地提到了下乡插队要度过的五大难关：跳蚤关、饮食关、生活关、劳动关、思想关。其中以我个人的看法而言，即使考虑到匮乏的物质生活背景，思想关大概是最难跨过的——这也可以解释为何大量知识青年在插队若干月到一年期间即返回城市这一行为。这些返城的知青从未将自己视作农村的一分子，甚至有些知青还可能会对于农村生活表现出嫌恶。然而对于在梁家河大队插队七年整的习近平而言，他则是真正地把自己融入了这片黄土地中，使得自己成功地混入了农民中，从一名高干子弟变成了一名朴素的劳动人民，我想这种精神即使放到今天依然是难能可贵的、值得我们学习的。我曾经考虑过这样一点，即如果把我扔到当时的社会环境中，让我去下乡插队，我能支撑多久，什么时候选择设法返城，然而最后思考的结果却是相当悲观的——我可能撑不到二整年。从这里我们也能看得出习近平本人**极强的适应能力和强大的精神世界**。

成功地成为一名农民对于习近平而言至关重要。在上世纪60-70年代的历史背景下，全中国绝大部分人口都是农村人口，而这些农村人口却是国内的生活质量较差的人口，陕北农村的生活环境在全国农村中也属下等。因此，在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这个群体所面临的困难最大，国家对于农村的政策扶持也属较多。问题在于政府的政策扶持能否真正地落到实处，为农民同志们带来切身利益。这一问题对于当今的脱产干部而言很难回答，毕竟他们已经脱离生产许久（抑或压根没有参与过生产劳动），对基层百姓的疾苦不甚了解，或者说，他们并不愿意了解这些问题。但是，只有深入到基层一线，深入到人民群众之中，才能知晓我们的政策和指令是否符合实际情况，是否能够为人民群众带来实际的效益。而在这一点上，我们的习近平总书记显然做出了一个表率作用。我相信，这也是习总书记能够获得全国大部分人民的支持的重要原因之一。

梁家河的农民们和县社干部在访谈时也提到，习近平是一个重情义的人，在1975年被推荐上清华大学后、80年代在正定、宁德、厦门等地任职时，他一直在设法帮助他曾经插过队的陕北地区的人和事的发展，包括关心陕北地区的电力问题，以及设法解决村里老朋友的治病问题等。在1993年和2015、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回到梁家河村，与他插队时的那些村民重聚。这一方面与他本人急公好义的性格有关，同时也与陕北的人民群众对于他的包容有关。在那个动乱的年代，尤其是在习近平的父母皆因为政治斗争而受到批判之时，梁家河为习近平提供了一个相对安全、宽容的生活和劳动环境，也是他这七年能够顺利成长，“系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的一个重要因素。有的访谈记录中提到，“陕北的农民们把这些从北京来的知青当成是毛主席身边的孩子来对待了”，这种比喻既生动又传神地体现了陕北的人民群众面对来自北京的知识青年的真实心态。

二、关于文化革命运动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针对文化革命运动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两场政治运动，在1976年“四人帮”被打倒后，不同的人则抱持着不同的观点。我们很难判定哪种观点是正确的，或者哪种观点是符合实际的。本段将围绕《七年岁月》这本书展开对于这两项政治运动的讨论，以讨论其实际效果为主。

**（一）有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一些讨论：**

书中反复强调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贯穿整本书的重要历史背景。对于这一段历史的评价对我国近现代史和文化革命运动史具有重要的意义。本书中的很多受访者，尤其是曾经的知青和县社干部，对于这一政治运动的背景都有所描述——1969年的中国，其工业产值已经大打折扣，工厂停止招工，学校停学，大量毕业的中学生滞留在学校中而没有负担学习任务。这既不利于新的适龄儿童入学，也不利于我国国民的就业和社会生产。基于这样的背景，以及毛主席对于农村的特殊感情，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则具有一定的必要性，“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也就成为了顺理成章的事情。后来这群知识青年再1969-1978年间陆陆续续地从公社和大队中返回城市，也有一些知识青年永远地留在了农村为我国农业生产继续做出贡献。

基于这样的历史背景，习近平本人也被卷入时代的潮流之中，于1969年随着北京的知青群体一起来到陕北插队，“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过五道关。当然根据书中记述的材料，五道关也是当时绝大部分知识青年所面临的实际情况。当年我国农村相对恶劣的生存状况使他们感到震惊，现实击碎了他们的幻想。也正是如此，知青群体中发生了分化。一部分知青，在面对这样的生存现状时对农村和它的生活环境产生了本能的厌恶——其直接结果就是他们在通过各种途径，如招工、提干、参军，试图离开农村。另一部分，则是与习近平总书记类似，自知很难离开这片土地，则索性与这片土地融为一体，为生活在这片土地上辛勤劳作的农民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帮助。我们并不能确定后者是否是自愿的或者说是被迫的，但是我们仍然应当对这些留在农村的知青群体表达足够的敬意——他们把自己的青春挥洒在了这片黄土地上，他们的知识为我国的农村和农业发展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我们无法批判试图逃离农村的知青群体，毕竟他们的决策是完全合情的；但是我们必须尊敬这些留在农村的知识青年，他们放弃了在城市的优越生活而选择了这种相对恶劣的生存环境，这完全可以看作一种**自我牺牲的布尔什维主义精神**。

上山下乡的历史背景对于习近平本人或许是一种挑战，但更是一种机遇。在陕北的农村中，习近平逐渐熟悉了各种农业生产的必要技能，逐渐地从一个不谙农事的城市青年变为一个与土地融为一体的农民，更是深入地了解了上世纪60-70年代我国农村的基本情况。对于我国的干部群体而言，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这种熟悉基层情况的干部的数量恐怕都不能占到绝大多数。而正是凭借这种对于基层的充分了解，习近平很快地与梁家河大队的农民同志们打成了一片，获得了农民同志们衷心的拥护和支持，也为他后来的履历做足了铺垫。无论是在梁家河，还是在正定、宁德、厦门，他对于基层群众的理解都贯穿他的整个任职经历中，也为他的一系列决策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基于此，我们完全可以说，梁家河塑造了今天的习近平、塑造了总书记习近平。而其他那些通过各种渠道离开农村的知识青年们，他们却丧失了这样一个充分了解中国农村社会的机会，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一种为了“更好的生活条件”而不得不放弃的东西。我们无法判定二者中到底哪个选项更具有价值——毕竟这是一个哲学问题，但是这种“不得不放弃的东西”显然能够为广大的人民群众提供更为可靠的帮助。

相较于习近平这些老三届（66，67，68届初高中毕业生）的初高中生而言，文化革命运动期间毕业的初高中生则显得更为不幸。他们在学校接受的教育已经不是现在意义上的义务教育，而是一系列过量的政治教育。这种过量的政治教育使得学生无法掌握必要的知识，最终在77年恢复高考时只能受夹板气：“在刚恢复高考时他们比不过老三届的高中生；老三届的高中生走完了，新的应届生又补上了空缺。”对于这些毕业生而言，初高中的学习经历则蒙上了一定的悲剧色彩。

中共党史对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段历史的评价是：“……广大知识青年到农村和边疆去了解社会，接触工农，在艰苦的环境中接受了锻炼，增长了才干，为建设农村和开发振兴祖国不发达地区做出了贡献，一些人成长为各条战线上的领导骨干和业务骨干，但是，大批知识青年失去在学校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造成人才成长的断层，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带来了巨大困难……”。这是从党和国家的角度对这场政治运动的评价。对于每个知识青年个体，我想他们对于这场运动或许会有一些不同的评价。但是对于习近平而言，这场运动既是他接触基层劳动人民的开始，也是他政治生涯的开始。这段插队的经历，则是他本人一生中的宝贵经历和重要经验。

**（二）有关文化革命运动：**

如果我们查阅更多的有关于文化革命运动的材料，或许我们会发现，文化革命运动仅仅在几个年份中的几个大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武汉）中产生了较大的冲击。而其他的一些中小型城市，如烟台、威海等，受到的冲击则并不是很大。在1966-1968年的高潮阶段过去后，人们对于“文攻武卫”之流的兴致在逐渐减弱，文化革命运动的冲击效果也在逐渐地下降。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习近平才得以在文化革命运动的大背景下找到一个容得下自己的地方——也就是陕北地区的梁家河大队，得以戴着“黑帮分子”的帽子继续生活下去。

在一些访谈记录中也提到了习近平在入团、入党期间所遭受到的阻力。这些阻力大部分源于他那已经被打为反党分子的父亲。在谈及他本人入团、入党的经历时，我们常常会提到那几位较为开明的、求实际的公社干部、县委干部，殊不知时代的大环境也会对此有所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化革命运动中那些不合时宜的“政治正确”也在不断地抹去，否则哪敢有人允许这样一个“反党分子”的后代入团、入党、担任党的书记、乃至推荐上大学呢！

三、其他的一些随感：

《七年岁月》这本书中的访谈记录，包含了许多有关插队期间习近平本人的生活细节。这些细节既使得我们读者得以更加深入地了解总书记其人，也引发了我们对于生活的一些思考。

**（一）关于“事必躬亲”：**

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我们注意到这样的一个现象：无论是修沼气池，还是打坝，抑或是组件铁业社、纺织组，习近平总是全程参与其中，把控重点环节（比如亲自前往四川省学习沼气池的构建），并且在其中需要劳动的时候还会带头参加劳动，这和我们常见的在办公室里面“运筹帷幄”的那些领导大相径庭，甚至可以说是完全相反的，然而事实上习的这些工作却收获了很大的成效。那么为什么习近平的这种办事模式能够取得成功呢？

习近平当时在村中所担任的职务，是村党支部书记——这个位置是中共最基层的党支部的一把手，是中国党的“神经末梢”，也是党密切联系群众的最基本的单位的一把手。在这个位置周围则是与党所直接联系的人民群众，群众们或许管不到“远在天边”的公社干部或者县委的干部，但是肯定会盯住与他们联系最密切的党委书记。我们注意到，共产党的干部并不能够成为传统意义上的指手画脚的官僚，而应当是能够实实在在为人民群众谋福利得好处的一般干部。那么对于一个村子的支部书记而言，仅仅为村子的发展提出意见、建议，乃至是“规划纲要”、“指导纲领”，都是不完备的——意见、纲要之流本质上都仅仅是画饼，而如果想要把饼烙出来，那么支部书记就必须要冲在第一线把自己的那些建议、纲要什么的做成具体的东西。

同时，我们在阅读的时候也不难发现，习近平作为一个外来的插队知青，看问题不偏袒，比较中立，通情理，在村中享有较高的声望。那么，他的声望在这个“事必躬亲”的过程中也会发挥重要的作用。他这种带头办事的态度，相当于直接告诉农民同志们，“这事肯定能办得成”，那么农民同志们自然会受到他的感召，参与到这些生产建设活动中。然而，这种威望也是在日常生活中积累起来的而非通过权力强行塑造出来的——这种源自人民而非源自上级的威望，使得我们这些看客、局外人在感动之余，又对总书记到了一种深深的敬意，毕竟来自人民的认可既是最难获得的，也是最有价值的。

**（二）关于“服务人民的方式”：**

我们注意到，在一份访谈记录中，提到了这样的一个细节：习近平在清华大学读化工专业的时候曾经跟同学谈道，他本人并不愿意在化工这条道路上走得太远，他本人更愿意做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政治家。那么是不是只有做一位政治家才能够为人民服务呢？

至少在我本人看来，这不应当成为唯一的一种方式。传统的广义理工类专业（理工农医）和广义的文科专业（经管文法），其设置的目的都是培养合格的接班人和各行各业的优秀从业者，尽可能地为推动社会发展来服务，只是二者达成这一目的的方式并不一致。用一种传统的比喻来讲，广义理工类专业做的是“做大蛋糕”，而广义文科专业做的则是“分好蛋糕”，这二者是同时在为“使每个人得到足够多的蛋糕”这一目标服务的。如果我们从这本访谈记录看，习近平本人在四川学习到的沼气技术，以及在组建纺织合作社、铁业社时涉及到的生产工具、生产方法，恐怕都会与工学（机械工程、化学工程与工艺等）有着直接的联系，脱离不开理工科的专业人才。事实上，这一点习近平总书记并没有忽略掉——他在后来历次讲话、会议中强调“五大新发展理念”时特意提到了创新（以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创新中的很大成分（尤其是技术创新）恐怕都要依赖于理工类专业的技术。

那么他的这种想法又是从何而来呢？一方面地，家庭因素恐怕对习近平本人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习近平其父习仲勋曾任西北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也在他的位置上做出了不朽的贡献，获得了陕北人民的认可和称赞（在这个访谈记录中也有所提及——在对当年知青、干部和农民访谈时他们多次提到习仲勋在陕北所享有的崇高声望）；另一方面，习近平在这七年内在梁家河大队中，已经体现出了一定的从政的潜质，包括他本人在调解农民内部矛盾时的得心应手，以及在村中赢得的来自农民同志们的认可，多多少少使他本人意识到他能够在党的干部而非工程师的位置上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另外地，中断的高中阶段学业对于他本人的理工科基础也有一定的副作用。

总书记本人的决策具有一定的历史性和特殊性，也许并不具有普适性。对于我本人而言，虽然我同时在行政班和专业班担任班长，但是我在班里的声望似并不及习在梁家河大队中的声望，在这方面也不具有显著的才能，那么我本人也许在技术岗位上为中国的工程学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未来的从业决策最好应当基于本人的实际情况，而非照搬其他人的经验。

四、结语：

在《七年岁月》这本书中，我们重新认识了这位貌似很熟悉的、常常在电视上出现的总书记，了解了他在梁家河村的种种事迹。读完这本书后，我们也对这位总书记生发了一种敬意。书中勾勒出的这样一位敢于直面生活中的困境，能够舍弃小我，成全人民群众的总书记，才是值得我们尊重的总书记。当然，从这本书中我们也只能看到总书记的一个侧面。如果想要完整的了解习近平总书记，我们可能需要查阅更多的文献材料、调查更多的人和事，方可得出一个完整的结论。

参考文献：

[1]中央党校采访实录编辑室.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M].中共中央党校编辑室:北京,2017.8.